

# 共产主义道德概论

( 1983年暑假全国师专共产主义  
道德讲习班讲稿汇编 )

青岛师范专科学校政治科编印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 说 明

受教育部委托，由临沂师专、青岛师专于今年暑假联合主办了共产主义道德讲习班。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周原冰教授等八位同志，系统地讲授了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理论。本书就是八位同志的讲稿汇编。

参加这次共产主义道德讲习班的同志，主要是全国师专担任德育课的教师。他们在听课以后，认为这些讲课内容对他们很有帮助，要求编印成册。青岛师专政治科负责了这次编印工作。在内容上，我们一律按讲稿原样，未作改动，但由于仓促成书，缺点在所难免，欢迎指正。

青 岛 师 专 政 治 科

一九八三年九月

# 目 录

关于对青少年的道德教育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	周原冰 (1)
道德和伦理学	北京大学	魏英敏 (29)
道德的本质、功能和历史类型	中国人民大学	马博宣 (51)
略论道德的阶级性和共同性	山东大学	臧乐源 (75)
道德规范	中国人民大学	王伟 (96)
道德范畴七题 ——谈谈道德范畴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山东省委党校	李光耀 (152)
关于共产主义道德原则的若干理论问题	北京大学	魏英敏 (177)
关于道德评价中的若干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	马博宣 (207)
真、善、美的相互关系	华东师范大学	周原冰 (247)
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理论探讨四题	武汉大学	陈楚佳 (271)
人生观、道德理想中的几个理论问题	武汉大学	陈楚佳 (286)
职业道德浅谈	山东师范大学	于超 (321)
清清白白的做人，孜孜不倦的育人 ——谈谈教师道德	山东师范大学	于超 (331)
论大学生的道德修养	山东大学	臧乐源 李树军 (337)

# 关于对青少年的道德教育问题

——在浙江省《青少年修养》备课会议上的讲话

周 原 冰

我们的《青少年修养》课的教育对象是中学生，大家要我谈点看法，我就讲以下几点，供同志们参考：

第一点，要积极引导中学生树立远大理想。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就是：积极引导中学生树立远大理想，对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这首先是因为中学教育是大学教育的基础。经过“十年动乱”，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我们现在确实感到教育、科学和生产建设的需要比例失调。这就是教育经费太少，科学人材（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方面的人材）太少。我们现在要搞现代化建设，如果科学文化不发达，不能培养出有高度科学文化水平的德才兼备的人材来是不行的。当然，这要靠高等学校和科研机关，但高等学校人材质量的提高，归根到底还要靠中学教育，因为高等学校学生主要来源于中学。中学学生的质量又主要指两方面：一面是指科学文化知识，另一面是指政治思想、道德情操。当然还有体育、美育，现在独生子女多了，群育似乎也该突出起来了。我们应该强调德、智、体、群、美的全面发展。大学生在这五方面应该都在中学时代就打好基础。根子正、苗子壮，大学教

育就要省力得多，可以拿出很多时间帮助学生深造。象现在这样，到大学还要化很多时间帮助学生补中学时代本来就该完成的课程，学校还要化很大精力去同学生讲一些做人的起码道理，不是一个很大的浪费吗？当然，这决不是说大学就不需要做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了，只是那应比现在高级一些、深刻一些。

其次，中学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直接后备军。现在，我国中学生毕业后能够直接升入大学的，大约占4.5%左右，以后可能逐渐增加，但是终究只能是少数，如若过多，超过了社会的需要，反而会降低了大学生的质量，会造成另一种比例失调的。我看，我们这样大的国家，中学毕业生直接升入大学，能达到20%左右就了不起，而中学则要普及，我所说的中学，不只是指普通中学，而是包括职业中学在内。因此，现在是百分之九十几，将来可能达到百分之七十或百分之八十几的中学生，都要直接进入社会，直接参加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直接后备军。如果他们都是道德品质很高尚，思想境界摆脱了低级趣味，都一心一意要把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好，都能够自觉地、主动地、创造性地进行劳动，都能够以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局为重，忠于人民、忠于集体，肯于帮助别人，决不自私自利，更决不损人利己，损公利私，很显然；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就一定会搞得更快、更好。

再次，中学生正是身心发育、世界观、人生观正在逐步形成的时期。这个时期，他们的可塑性很大，尤其是初中时代对于一个人的一生影响最大，据我自己的体验，初中二年级这个阶段，更是特别重要的，因为从初中一年级到进入高

中，这时大体上是十二岁到十八岁。这个时期，从生理上说正是青春发育期；从生活和思想上说，从离不开父母和家庭的小圈子到接触更多陌生的人，象是进入了小鸟那样跃跃试飞的时期，什么都要想一想，问一问，摸一摸，什么都觉得新鲜有趣，不愿受到约束，可又往往容易轻下结论，也容易轻信；从知识上讲，也是处于一个关键时期，懂得很多了，可又都不甚了了，一知半解的东西比较多，因而今天听了一种观点讲得头头是道，他们很容易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可是，明天听到另一种观点讲得更生动、更头头是道，于是就又会推翻昨天的“信仰”。我在初中二年级时，有个老师是你们杭州人，他送我一本书叫《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题了“发愤读书、努力革命”八个大字，我非常佩服，这八个字也就影响了我一辈子，其实，他送给我那本书，当时我是看不懂的，但也拼命地看，别的以后也忘了。但第一句话说“太阳下一切都不是永久的”，这句话还记得，我是生吞活剥地记下来的。在初中时代，哪个老师凶，哪个老师和我谈过话，为人是否正派？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我虽没读过高中、大学，但以后年龄大了，记得的事情反而少了，易于淡忘了，而自己的一些看法和观点也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了。总之，不仅是初中，整个中学时代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来说都是关键时期，世界观在形成中，但还未定型，是完全可以转变的。就拿今年开展的“五讲四美”活动来说吧，很短时间，社会风气同这之前相比变得很多。但变得最快的是中、小学学生，大学生也有不少进步，也在向好的方向变，但比中、小学就要慢一些。在中、小学里，小学生是老师怎么说，老师怎么做，他们也就怎么干；听老师的；看老师

的，学老师的；中学生有所不同，只要老师讲清道理，道理讲得他服了，他就会忘不了；反之，如果讲的他不服，他就打上个问号。

所以，我们说，在中学生中进行远大理想教育，积极地引导他们树立远大理想，是很重要的，是对我们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人材具有重大意义的。

我不赞成现在有些同志老是在说：“现在青年道德下降。”为此叹息不止。我当然也不赞成闭着眼睛硬说现在青年的道德风貌很好，甚至比“十年动乱”前还好。问题是在于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才能引导青年前进，在于我们成年人、特别是教育工作者有责任要引导青年前进。因为：

第一，我们自己所以有今天的思想状况、道德状况、知识状况，是成年人、中年人特别是当年做我们老师的（我这里要指的是广泛意义上的老师）引导的结果。今天四十多岁的同志可以回想一下，五十年代的党是怎样教育我们，引导我们的？我们今天的进步，能够说与那时候的中年人的引导、带路没有密切关系吗？现在的青少年，在“十年动乱”前，可以说是一张白纸，也几乎是一无所知，可是一到他能够记事时起，满眼看到的就是“打、砸、抢”，抄家，戴高帽子，逼老师90度弯腰，“好人挨整”，坏人坐“直升飞机”。一句话，好事看得很少，坏事看的很多，眼前一片漆黑，是非、善恶、荣辱，被“十年动乱”中的“现实”生活搞得颠倒了，使他们幼小的心灵受了严重的创伤，所以，我们不应该轻易地责怪他们，而应该积极地去帮助他们，引导他们从颠倒了的混乱了的思想认识和生活习惯中冲出来。当然，我说的是不要“轻易地”责怪他们，请注意“轻易地”

这三个字，决不是说全然不能责怪他们，因为同在那个时期生活着的，仍然还是多数青年是好的，或者快变好了的，不轻易地责怪他们并不等于可以放任自流，更不等于对那些违法乱纪甚至犯了罪的青少年也不敢执行纪律或依法惩处。如果那样，那就更是不负责任，放弃了我们作为成年人、中年人对于青少年所应尽的引导责任。

第二，我们亲身经历了三个对比，而现在的青少年恰恰缺少这三个对比的亲身经历。

一是新旧社会的对比。我们是经过旧社会生活的，旧社会的罪恶，旧社会的黑暗，旧社会的痛苦，总之，旧社会的辛酸苦辣，我们都是亲见、亲闻、亲自感受到的，在旧社会，就拿上海来说吧，普善山庄每年冬天就要到当时的法大马路现在的博物馆一类地方拉死人，为什么？因为许多穷人连个住房也没有，只好睡在那个地方。我本人在三十年代也在上海睡过一两天马路，那日子可不好过，新社会这种情况没有了；在旧社会，毕业就是失业，谁管你有没有工作？谁给你分配工作？只有自找门路。那时，想当个小学教员，可是每逢阴历的六月和腊月，就要为抢夺饭碗而斗争，我们称之为“六腊战争”。现在的青年人没有这个经历，往往以为安排工作是国家有求于他，工作分配得不好就骂娘，工作单位一定要以离家越近越好，稍微远些就不去；现在还有些青年只听人家说我们生产很落后，这当然也是事实，他们哪里知道在旧社会我们是个什么样子，新社会的发展速度有多快，特别是1949年到1956年这一段，生产蒸蒸日上，农业的发展速度是世界第一。有些人喜欢大谈什么人道主义，似乎我们的新社会不把人当人，其实不把人当人看的是旧社会，是现

在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当然，林彪“四人帮”也不把人当人，对广大的对革命有过贡献和正在继续为革命出力的老干部采取了种种非人的虐待手段，但他们是反革命，是反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人，根本不能把他们的所作所为标在新社会的帐上。“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才是事实，然而现在的青年人没有这个新旧社会对比的亲身经历。

二是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指导的对比。解放以后，我们的确经历过几次折腾，我们经历过这些折腾，但也经历过在正确路线和政策指导下取得伟大胜利的喜悦。两下对比，所以我们就能够懂得：每次折腾虽然都与我们党的指导路线的错误有重大关系，但这些路线指导的错误，既不单纯是哪个人个人的问题，也无关于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无关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本身，“否则，就不会被我们党称之为错误的路线或政策了，也不会由我们党和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自己来纠正而且取得成果了。可是，现在的青年一般没有这个对比的亲身经历，脱离了人们的社会实践和认识规律，这就难怪他们总是感到不可理解了。

三是解放后十七年和“十年动乱”时期的对比。现在的青年们往往只看到“十年内乱”时期那一套，而且在这时期他们也还太小，还不懂事，于是就不免会产生三个混淆，就是：把党内的“左”的错误特别是把林彪“四人帮”那套反革命、反社会主义的政策当作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所决定要采取的政策，把党内在部分变了质的或者犯了错误的同志中的不正之风，同党的领导混淆起来，尤其严重的是把林彪、“四人帮”搞的那套封建、法西斯专政手段也当作我们

党的领导；把被歪曲和篡改了的东西以及我们某些领导同志在某些时间，某些场合，某些条件下讲得不正确、不科学、不太符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话，都当作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现在，“四人帮”被粉碎了，错误的东西被揭穿了，但他们还有这三个混淆，于是就以为社会主义，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也全错了，而在海禁大开以后，又把西方那些陈年古代的垃圾当作珍宝，以为新鲜、了不起。有人说，现在青年中发生了什么“信仰危机”！？这话不对！应该说，他们还没有建立起什么信仰，当然也就不存在什么产生“信仰危机”的问题。不错，似乎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甚至在此以前，也曾跟着喊过许多空洞口号，表示过许多空洞的决心，甚至还跳过什么“忠字舞”，但那些既然是空洞的，也就是那时并没有真正在内心建立什么信仰。何况社会主义，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都是真理，是一定可以使他们信服的。真理不同于宗教的教条，它不是从任何圣贤豪杰的头脑中分泌出来的，也不是什么上帝的启示，而是事实的客观规律、客观实际的反映。正因为这样，它就只可能存在暂时不被某些人们所理解的问题，却决不会存在什么信仰危机问题。因而，归根到底，在于我们这些有过三个对比亲身经历的人们，应该现身说法，积极地去引导他们去认识真理，帮助他们从认识真理中树立远大理想。

帮助和引导青少年树立远大理想，当然不是要他们胡思乱想。胡思乱想不是理想。什么是理想？称之为理想的东西，一定要有以下三个条件：一是要是可能实现的，也就是合乎规律的；至少是按一定阶级自己的主观逻辑；被他们所认

为是有可能实现的。二是要是现在尚未实现的，如果现在已经实现了，那也不成其为理想了，而是已经变成现实了。三是要必须经过一番努力才能实现的，不经过努力就自然而然实现的那也不叫理想。所以，人们的理想总是面对未来的，而科学的理想就更要脚踏现实，总结过去，力求符合于客观规律。因而，理想应当是远大的，而人们有了理想，就有精神的动力。任何道德都是和一定的理想连系在一起的，没有理想，也就没有了道德。我们说，要积极地引导和帮助青年树立远大理想，指的是共产主义的理想。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的，是历史证明了它正在逐步实现中的，而它的每一步的实现都是要经过人们的创造性的劳动和艰苦奋斗的，都是要付出汗水以至血的代价的。因此，积极地引导和帮助青少年树立远大理想，就有两个关系要特别地讲清：一个是个体和整体或个人或社会的关系要讲清。我们并不反对讨论和研究人的价值，但我们一定要指出：人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得出有什么价值的结论。人的价值，严格地说，只能说是人的社会价值。对社会贡献大，价值就大；对社会贡献小，价值就小；对社会毫无贡献就没有价值，叫做白白荒废了一生，那些专对社会起坏作用的人，就是对社会只有负价值。林彪、“四人帮”其中包括康生在内，就都属于这一类。当然也可能有人是对社会既存在正价值，也存在负价值，问题是总帐一算，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功，从而决定了他的一生，究竟是有正价值还是负价值。可是，人的价值这个命题，在以往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嘴里，实际上都是说的个人价值，于是，什么“人的本身就是自私”的呀，什么“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大家”的呀，什么“合理利己主义”的呀，

什么“中学生的价值”、“大学生的价值”，“留学生的价值”，把自己的学历当作商品，却不讲对社会作出什么贡献，也不讲社会是如何养育了他们，而是一个劲儿地向社会要什么“人的价值”，如此等等的思想，就统统出笼了。他们自以为是抬高自己，实际上把自己当作可以拍卖的商品，不正是贬低了自己吗？他们眼睛只看到自己、看到个人，哪还会有什么远大理想呢？另一个，是要把长远利益和暂时利益的关系讲清。我们并不反对也要重视暂时利益，因为暂时利益是很现实的问题，是我们取得今后一步步胜利的阶梯。但是，最重要的是要把长远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暂时利益放在服从的地位，看成它只是达到长远利益的一个步骤而已，只要有利于长远利益，暂时利益虽然受到一些损失，是无关大局的。请注意，这里所讲的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都是从社会的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的统一、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统一来讲的。不能也不是从单纯个人的利益来讲的，这样眼光才能看得远，否则一遇挫折就会灰心丧气了。而事实上，任何理想的实现，都免不了要经过数次、数十次、数百次以至数万次的失败和胜利才能最后成功的。我们既然并不反对重视暂时利益，当然也就并不一般反对讲“实惠”。但是，首先，这里讲的“实惠”，决不当指的只是个人的小的实惠，更不是为了个人而可以损坏集体的所谓“实惠”。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实惠，到头来常常是要吃亏的。因为你也要个人的实惠，他也要个人的实惠，这就要发生矛盾，不是你的“实惠”侵犯了他的“实惠”，就是他的“实惠”侵犯了你的“实惠”，到头来损害了社会和集体的“实惠”，从而又使自己也得不到“实惠”，从长远的观点来看

就反而要吃大亏。其次，这里讲的实惠，应该理解为长远利益与暂时利益的统一，理解为踏踏实实，理解为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和取得货真价实的社会进步的效益，理解为同那种空话、大话、假话相对立的科学态度。

## 第二点，要正确地估计当代的青年。

我们应当明确：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当代的青年，是一个重要的紧迫的课题。现在有人讲什么“两代人的鸿沟”，这提法不对，具有挑拨性。事实是，青少年人中有好有坏，中老年人中也同样有好有坏；青年人对中年、老年人的心情和问题，有的人理解，有的人不太理解；中年、老年人对青年人的心理状况和实际问题也是有的人理解，有的人不太理解，有的人不太理解，怎么能够不加分析地说什么“两代人的鸿沟”呢？“鸿沟”，是楚汉相争时划的一条界限，不准逾越。若是不加分析地把青少年同中老年之间的关系，说成具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不合乎事实，也不利于促进相互之间的团结嘛。但是，也要承认另一事实，就是的确我们不少同志对青少年理解得很不够。现在是两方面情况都有。一方面是有些同志离开社会历史条件，以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甚至民主革命时期的青年作标准来衡量当代的青年，这样，往往就容易把他们在新时代、新形势下所产生的新长处反而当成短处，看不惯；然而，在另一方面也应当公正地说，现在也有些青年人不懂得历史，不懂得在旧社会受过苦难、经过流血奋斗的中老年人的心情，不尊重他们的宝贵的经验教训，却自以为是，以致终于上了大当。这是一个事实。就是不管过去、现在以至相当长的未来，总有两种力量在争夺青少年。就目前来说，就确实存在着一个我们马克思

主义者及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的向上势力在同社会上各种坏人和反社会主义的有形无形的势力之间进行争夺青少年的斗争问题。旧的习惯势力和国内外各种反动力量、腐朽力量把青少年向坏处拉，我们则把青少年往好的方向拉。也应该承认，我们中年、老年人是有局限性的，青少年当然也决不可能没有局限性，我们就应该在克服两方面的局限性上互相促进。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地认识当代青少年，就不能采取正确的办法来帮助和培养他们，使他们更健康、更茁壮、更可靠地成长，相反地，就会使他们易于为各种旧的、腐朽的甚至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而走向歧途。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一定要把青少年的问题放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范围内加以考察。这就是说，不能孤立地看各种个别现象，而要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去把握当代青少年的本质和主流。

首先，应该看到，在“十年内乱”中，他们是受害最深的部分，心灵上受到严重创伤，也确有许多实际问题亟待解决，可是现在还处于调整时期，青少年的许多切身问题暂时还来不及或尚缺少条件解决。在“十年内乱”中，一方面当时在思想上受了林彪、“四人帮”以及他们的一些帮凶们的很多毒害，政治上受骗上当，有的还走过一段长短不等的弯路以至邪路；另一方面，是没读什么书，有的小学没毕业，就上山下乡，知识很贫乏。由于这两个原因，也就往往会出现是非颠倒、善恶不分、荣辱难辨；这是不能主要怪他们的。现在，当时的少年变成了青年，当时的青年变成了中年，这些中年生了孩子仍用在“十年内乱”中所受到的那套来教育孩子或无意中影响了孩子，以致今天的少年还要受害。粉碎“四

人帮”后，当然首先要解决政权掌握在谁手里的问题，所以在一段时期内当然要首先对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事业而被迫害的老干部、老知识分子、老工人的问题，进行平反昭雪和落实有关政策。这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但从而对于直接解决青少年的切身问题也就相对地显得不够了。青少年的问题当然要解决，而且确也在积极解决当中，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只能说解决得还不够，还不平衡，还有阻力，全然否认就不合乎事实了。可是，“十年内乱”使得我们真象害了一场大病，而且是综合症，当然，也就不可能在十天、半月以至一两年就什么问题都解决好了。青少年往往对此不能理解，有些埋怨、惆怅。因此，我们要从“十年内乱”这个历史背景和当前的社会条件来理解他们的心，掌握他们脉搏的跳动，并且要靠我们去帮助他们提高认识，大家共同来解决问题。就青少年本身的思想品德的状况来说，现在也是一年比一年好了。首先是三中全会以后，接着是去年的中央工作会议，我们党的一系列切合实际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使整个社会向上和向前发展，拨乱反正，自然也就影响了青少年。当然，现在打架动武的、聚众闹事的，作风流里流气的也还不少，但比前几年已不那么吃得开了，作风正派的、品德高尚的青少年比较多，就是一些作风不好的青少年也要对他们作出公正的分析，他们也在改，或者很想改，社会舆论开始起约制的作用了，而且应该看到更多的青年正在刻苦地自学，尽管这里面还有许多问题，有的方向不对头，思想和道德品质的境界也有高有低，但总归是在认真读书、求知识，这总是好的现象，我们应该看到他们这些进步和好的方面，有的青年说：“我们是生在困难时期，长

在动乱时期，现在又面临调整时期”，大有“生不逢辰”之感。但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反映了他们的苦气、闷气、怨气以及从而表现出来的迷惘、徘徊等等，确实是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所不可避免的，合乎客观规律的。我们就应该正视这个客观规律而循循善诱地加以引导。

其次，应该看到，现在的青年正处在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它的意义比历史上任何一次转折都深刻。正如三中全会所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这就要求改变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管理方式，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所以是一场广泛的深刻的革命。但是，在这场深刻的革命的转折关头，首先就要碰到我们许多同志自己头脑中的“老一套”思想的阻力，这就是个大问题。而在这样的大变革过程中，新的一套当然不可能一下子完全成熟，还要不断改进，于是那些思想僵化的人们就往往认为是不稳定的，甚至以为是脱离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而青年们是要求改革的，可又不懂得改革是不可能一蹴而成的，不太懂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条是不会变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基本原则是不会变的，因为这些都是真理。正因为他们赞成改革，可又缺乏经验，缺乏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原则的深刻认识，就不免想入非非，甚至把外国垃圾当作珍宝，这又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有些青年对在我国居然出现“十年内乱”很不理解，是因为他们不懂得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前身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有几千年遗留下的封建思想，还有汪洋大海般的小资产阶级、小生产者的思想，还有流氓无产者的思想，林彪、“四人帮”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

历史的必然，只是经历的时期太长了，所花的代价太大了，我们是应该永久记住这个教训的。可是经过这场大动乱，我们正象把腋挤出来了，一切废话、空话、大话都拆穿了，现在又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上来了。坏事变成了好事。今后的振兴就会是在更加牢固的基础上，扎实实地而又大踏步地前进了。如果我们能把这一点同青年们讲清了，他们是通情达理的，是会理解的，而他们一经理解了，他们的那种勇于改革、敢于探索的精神，就会在我们这个大的转折关头，发出无穷无尽的光和热。

最后，应该看到，当代青年是生活在第三次科技大革命和海禁大开的时代。十八世纪后半期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十九世纪后半期电力的发现和应用，二十世纪后半期原子能和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应用是近代人类历史上的三次科学技术大革命，每一次都引起了整个社会生产面貌的大变革，从而也使整个的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尤其是一直延续到现在的第三次科技大革命，就世界范围来说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尚未改变的情况下发生的。资本家还占有生产资料，劳动力（包括体力和脑力）还是商品，而资本家购买了科学家、技术人员的劳动力，也就占有了由于他们的脑力劳动而取得的科学技术上的成果，这些科学技术上的重大成果和生产的突飞猛进，另一方面也就使得资本家的利润成百倍、千倍地增长，这就使资本家可能不再主要依靠减少工资和延长工时的办法来剥削雇佣劳动者（包括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而转为主要依靠采用新技术、新发明、新发现来进行剥削，并且能够拿出其利润的一部分来缓和他们和广大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加上先进的资本主义